

“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学术讲座与学术研讨会综述

苏德毕力格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学术讲座与学术研讨会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这是首次在内蒙古地区举行的探讨近代边疆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学术活动,旨在促进学界对边疆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进行多方面,多学科的研究。

关键词: 边疆; 中西文化; 基督宗教

中图分类号: B979 **文献标识码:** A

近代化也叫现代化,它们源于同一单词“modernization”,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步入长期而艰难的近代化进程。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内地迈出了经济近代化的第一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近代化也从生产技术领域逐渐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促成传统社会开始转型。然而广大边疆地区的近代化却姗姗来迟,未能与洋务运动同步而起。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内地掀起了“实业救国”的浪潮,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时的边疆地区特别是塞北蒙古高原仍是“田园”“牧歌”,所谓“工业化”依旧遥不可及。不过,被蒙古人称之为“西来的喇嘛”的西方传教士们悄然来到塞北,他们在“宣教”的同时,将西方文化与先进科学技术带入塞北,也为塞北多民族、多元文化信息反馈于西方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渠道。有鉴于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共同筹划了“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系列学术活动。该活动由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访问学者计划和档案文献出版等四个部分组成。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作,“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于2009年5月27日至31日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来自北京、香港、南京、上海、广州、山东、河南、福州、武汉、四川、兰州、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和在读研究生等三十余人参加。

2009年5月27日上午系列学术活动在内蒙古大学学术会议中心8号会议室隆重开幕。参加开幕式的有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王万义教授、内蒙古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王建华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美国旧金山大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吴小新博士、伦敦大学 Rolf Gerhard Tiedemann (狄德满)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Patrick Taveirne (谭永亮)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张先清副教授、内蒙古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张志忠教授、内蒙古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赵勇、所有与会代表以及内蒙古大学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幕式由内蒙古大学校长助理、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主持。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王万义教授致欢迎词。开幕式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所发表题为“全球化与多民族社会传统宗教文化所面临的诸问题”的精彩演讲,拉开了学术活动之序幕。在此后的四天(27日——30日)时间里进行了三场专题学术讲座和八组学术研讨会。

一、学术讲座内容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教授在其题为“全球化与多民族社会传统宗教文化所面临的诸问题”的讲演中，从世界文明与宗教的“文化圈”理论、亚洲宗教生成的三大“板块”及其对全球宗教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宗教与民族之文化交织所引发的国际焦点问题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全球化”对多民族社会传统宗教、文化所带来的挑战和令人深思诸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以其“普世化”、“国际化”和“跨文化”而向世界各地多民族社会的“本土化”、“民族化”和“处境化”提出了全面挑战。现代科技带来的交通便捷、信息同步也打破了以往传统宗教、文化相对封闭、隔绝之态。这样，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大潮在“全球”性的涌动、渗透中几乎可以真正“遍及人间”，不留任何死角。而以往各民族、各地域之间交往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而形成的社会、民族、文化、宗教之“内涵式”发展则很难继续畅通，很有可能因受外界的强大影响而出现“外延式”发展之转型。最后他指出：这种情况下的“边疆”与“核心”也可能是交替的、换位的；“全球化”已消解了“边疆”与“核心”的绝对划分，其民族宗教的交织影响也已是多层面、全方位的。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谭永亮博士作了《欧亚文化在塞外的相遇：以晚清民国时期的内蒙古为例》的专题讲座。谭博士在论文集《20 世纪的蒙古：被困于内陆的世界主义者》和其他多篇论著的基础上，主要对于晚清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传播、传教士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史做了宏观的叙述。讲座信息宏富，视野开阔。很显然，谭博士在其专著《汉蒙相遇与传教士的事业：司各特会士的鄂尔多斯的史，1874—1911》出版以后，依旧跟踪东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一直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所以其演讲包含了大量新的学术前沿信息。演讲具体内容分为“最初的相遇”、“古伯察和秦神父的旅行”、“多国奥德赛：西方探险家、科学家和蒙古学家”、“新教传教士”、“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城川的蒙古族天主教社区”、“内蒙古的教案”、“传教士的威力和地方教会”、“田清波神父和文化缠结”和“文化相遇、族群性和差会”等十个部分，几乎覆盖了晚清至民国时期围绕基督宗教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及其研究的所有方面。演讲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的基督宗教传教士为线索进行叙述，在叙述中谈到修会和差会在边疆地区近代化过程扮演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局限和内部的差异。

伦敦大学狄德满教授作了题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范例、方法、趋势与展望》的专题演讲。狄德满教授指出，在 19 世纪前，中国文化通过在华耶稣会士，不断地被介绍到西方，当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普遍持赞许甚至于崇拜的态度。到 19 世纪，受工业革命影响，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由热变冷，而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华的相继失败更体现出中西对对方的无知；稍后，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他们在华开展的医疗、教育、出版等活动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实践。总体而言，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人表现得比较主动。西方学者的著作主要围绕“早期中国社会是否静止不变”、“中、欧社会之间的异同”、“中国是否孤立于世界之外”、“儒家是否为中国现代化的阻力”、“早期世界的中心是中国还是欧洲”等问题进行了争论。二十年前的著作大多以欧洲为中心，认为世界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欧洲人的历史；最近二十年的著作以中国为中心，认为西方只不过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以王国斌、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最具代表性。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新理论对解读历史有其深刻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厦门大学张先清博士作了题为《“边疆”何在？——近代中国边疆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视角》的专题讲座。张博士首先扼要回顾和分析了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近代中国边疆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针对研究视角的扩大及文献资料的开发与解读问题提出了一些新思考。他强调，为推进本领域的研究进展，十分有必要在近代中国边疆基督教史研究中引入微观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其优点是既可以避免中国中心观主导下忽略教会（传教士）作用的不足，又不会流于地方史研究中的边缘化、碎片化，而是强调在研究过程中将教会（传教士和教徒）、地方社会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深度的文化解释。此外，还应力求将边疆基督宗教历史资料放置于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

境下加以阅读，在历史资料堆中进行“田野”工作。总之，学界应该走出将边疆研究完全视为“内地”对立面的误区。所谓的“边疆”，并非简单的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缘”概念，而是具有文化含义的边疆。这种边疆更像是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相遇借以发生的互动地带（Interaction zones）。边疆基督教史不应是中国边疆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的简单交集，而更应该从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角度出发的超越边疆的边界研究（border study）。

二、学术研讨会内容简介

除了四位资深学者的专题讲座，这次学术活动安排了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 21 名学者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供大家交流和探讨。这些报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这是与会学者议论颇多且比较集中探讨的研究领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宝贵贞作了题为《遣使会与塞外三个传教中心的形成》的报告，指出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C.M.）于 1785 至 1865 年间负责江浙、直隶、蒙古等地教务，在中国传教达 80 年之久，它上承耶稣会，下启圣母圣心会，为基督教在塞外拓展贡献卓著。该报告主要以清代天主教传教中心转移为背景，探讨遣使会与内蒙古三大教区的形成历史，为进一步研究天主教在塞外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内蒙古大学教授苏德毕力格在其题为《天主教与清朝禁垦牧地政策的废弛》的报告中，以有关“教会置产”的条约规定作为主要线索，探讨了天主教的传入对清朝固有的禁止开垦蒙古牧地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作者指出，禁止内地汉民随意进入蒙地开垦牧地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制度，直到 19 世纪中叶，这一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内地汉民和蒙古人私行开垦牧地。19 世纪中叶以后，移居蒙古地区的内地汉民人数大增，伴随着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一个新的势力——西洋天主教也来到蒙地并迅速传播开来，促使清朝传统禁垦牧地政策的废弛，进而对蒙旗社会变革起了重要的作用。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怡所作的《土地、边界和基督宗教：晚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在鄂尔多斯的活动》的报告，对于圣母圣心会（C. I. C. M.）在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的活动及其所带来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教会租买蒙旗土地、组织移民开垦以吸引汉民入教等，在地广人稀的边外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取得显著效果。可以说，教会的存在成为加速汉人向蒙古边外移民，促使蒙古社会剧变的催化剂。并以鄂尔多斯和河套为例，剖析内蒙古地区在面临由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型时的特殊性以及天主教会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探讨了晚清以来西方宗教文明和汉族农耕文明结合下的近代化进程给边疆社会秩序以及蒙古游牧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张彧博士在其题为《七苏木购地案始末》的报告中指出，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逐渐认识到土地对于传教活动有很大促进作用，遂开始在内蒙古地区大量租赁、购买土地，以信教就可以租种教会土地为条件吸引贫苦农民入教。教会人士和一些史学工作者都对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获得土地的活动作过简单的介绍，但大都言之不详。张博士以《教务教案档》作为基本史料，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详细梳理和深入探究了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较为典型的购地活动——七苏木购地案，为人们进一步认识该修会在内蒙古地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北京联合大学佟洵教授所作的题为《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再次传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的报告指出，景教、天主教、东正教虽然在蒙元帝国统治时期在中国得以传播，但是却没有在中国取得长足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基督教对元朝统治者的过于依存，是它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亡的主要原因。在元代，基督宗教始终未能走出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圈子而深入到民众，植根于中国百姓之中。其次，其教理、教义、礼节仪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距较大，自始至终未能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其三，基督教本身被蒙上了一种外来征服者的色彩，所以广大汉族民众对基督教始终存有戒心，心生疑虑，甚至有敌对情绪。其四，在罗马教廷与元朝皇帝之间的关系中，传教士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暨南大学吴青博士在其题为《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策略浅析——以该会在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事业为中心》的报告中指出，晚清以来，圣母圣

心会在西北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对于西北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有鉴于此，作者以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事业为中心，对该会的传教策略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天主教传播与近代中国西北社会的关系。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梅荣在其题为《庚子年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教案新探》的报告中指出，庚子年在达拉特旗所发生的重大教案，与达拉特旗同教会之间形成的长期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主要利用清代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对天主教在达拉特旗的传教情况、庚子年前教会与达拉特旗衙门及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达拉特旗庚子年教案的起因，经过及其结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分析。

此外，呼伦贝尔学院的松迪教授作了题为《关于基督东正教传入哈穆尼堪鄂温克地区》的十分新颖的报告。松迪教授指出，随着沙皇俄国的向东扩展，17世纪中叶基督东正教传入哈穆尼堪鄂温克地区。基督东正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哈穆尼堪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对于他们接受俄罗斯先进文化起了推动作用。但哈穆尼堪鄂温克人结合自己的游牧生活的特点，信仰基督东正教的同时，还信仰佛教和萨满教。所以说，哈穆尼堪鄂温克人是同时信仰多种宗教的部族。信仰基督东正教后，他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衣食住行方面而言，他们似乎成了西方化的游牧民族。

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南鸿雁基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天主教在当代传播的考察研究，作了题为《草原牧者——边缘地带上的天主教会》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当地神职人员身份的复杂性和该地区由原先的传教中心完全沦落为边缘的问题。作者还提出，由于该地区地处偏远，官方认可的教会和民间教会在这里都有自身的发展空间。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的官方教会与民间教会之间事实上也没有隔绝交流，这在神职人员身份的认同问题上都得以体现。此外，由于这种共存现象和当地的多民族聚居状况，致使当地的天主教文化显示了与其它地区不同的特色。

（二）传教士与相关人物研究

内蒙古大学阿拉坦宝力格教授所作的题为《一个向导的命运》的报告，将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叙述了一位为东西文化交流默默奉献的普通向导和蒙古天主教徒桑达钦巴的事迹。作者认为，天主教代表西方的文化跟随轮船、大炮、航海者、商队来到东方的时候，在起初阶段也遇到了不少东方人的排斥。西方的宗教势力希望彻底占领东方的领土，而东方的传统文化也想彻底排斥西方的思想。这便导致了两个文化之间的摩擦和排斥。而这种排斥心理被反映到了一个向导——桑达钦巴的身上。南京大学特木勒博士的题为《蒙古公爵拉尔生：他在国家、族群和文化边界的生涯》的报告，阐述了瑞典人拉尔生作为美国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的传教士来到漠南蒙古后的经历。作者指出，拉尔生怀抱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来到蒙古，后来不仅自觉并超越了自己的文化优越感，几乎归化成了蒙古人。而更为耐人寻味的是，拉尔生以“蒙古公爵”之称号闻名于汉地的欧美人群体，20世纪初到蒙古考察的很多欧美国家的探索家、旅行家和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仰仗拉尔生的帮助，因为他与蒙古的王公和活佛有广泛的交游网络。拉尔生在蒙古与欧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吴宁博士在其题为《传教士与人类学家——对比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康国泰的研究》的报告中，通过对比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康国泰的研究，从传教士与民族志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历程。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康国泰作为人类学家的人生经历，并试图从他个人的社会背景、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视角、理论方法来探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西方人类学史和中国人类学史发展历程。

（三）传教士、教会的塞外社会公益事业研究

内蒙古大学刘青瑜博士所作的《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慈善公益事业及其影响》的报告，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阐述了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的慈善公益活动。作者指出，当时在内蒙古地区有许多天灾和人祸，如荒年、水灾、旱灾、瘟疫、匪患等。除此以外，还有孤寡、老弱、弃婴及其它各种不幸

的人，都需要设法救济。面对此情，传教士们从事了救济灾民、兴办育婴院及安老院、建立公墓等各种公益活动，对当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尚季芳所作的题为《传教士与民国甘宁青社会赈灾研究——以地震为中心》的报告指出，西方传教士在着力布道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该地区的自然灾害。传教士在第一时间深入灾区调查，以客观公正的眼光记述灾情，撰写详细的调查报告发往外界，使外界对灾情有了明确地认识；同时，传教士身体力行参与到灾区的救济当中，他们将各地捐来的款项以以工代赈、兴办贫儿院的方式用于救济灾民，使灾区得到部分复苏。四川文理学院邓杰博士所作的题为《基督教与四川羌寨早期社会改良》的报告指出，1939 年底，中华基督教会成立边疆服务部后，在四川羌寨进行社会服务工作，主要内容有：提高边民精神生活的基督教传播；增进边民知识水准的教育服务；试图改善边民物质生活的农业生计服务；希望能解除边民疾病痛苦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些服务工作提高了羌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在该地区产生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四）基督宗教在西北穆斯林社会传播的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杜彦波所作的题为《中华内地会在近代西北穆斯林社会传教活动研究——以甘宁青为中心》的报告指出，内地会在西北穆斯林社会进行了长期的传教活动，但最终失败而告终。内地会对穆斯林传教的失败与黯然退场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难以避免的。内地会为传教而从事的社会事业，在客观上，对西北穆斯林社会的发展和减缓民众的疾苦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同时作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组成部分，内地会在西北穆斯林的传教也有消极的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新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顾秀艳所作的题为《新疆乌鲁木齐市基督教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的报告指出，20 世纪 40 年代后，尽管外国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受挫，但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并没有停止。1943 年河南、四川等地灾民来到新疆，其中除有原来就信仰基督教的信徒自主传播基督教外，还有由中国人组成的内地各基督教组织也纷纷派人来新疆传教。这些组织先后在新疆成立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基督教聚会处（小群）、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耶稣家庭等基督教会和西北灵工团、西北遍传福音团和基督教徒布道会等传教团体。

（五）教会文献、传教士与清代地图绘制、西北舆地研究中基督教知识传播的研究

山东省邹城市党史研究室冯宪华博士所作的题为《The Chinese Recorder (1867-1941) 视野中的游牧蒙古世界》的报告，就该文献所载有关蒙古人和蒙古地区的 64 篇文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并用表格的形式归纳、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线索。冯博士还简短地总结了 The Chinese Recorder 视野中的蒙古自然与社会世界、蒙古宗教世界、传教士基督教福音宣教工作，并简述了传教士景雅各（James Gilmour）对中国蒙古地区研究的贡献。上海大学哈日巴拉博士在其题为《列强宗教势力在中国边疆地区的消长——以日文资料为线索的考察》的报告中，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上的文献档案为路径，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基督教各派（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在中国边疆地区（包括今天中国东北、内蒙古、华北、西北地区）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填补了这一时期的一些史料空白。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哈斯巴根在其题为《西洋传教士与清代蒙古地图的绘制》的报告中指出，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清朝大力进行经纬度测定和舆图绘制的活动，其结果就是代表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的《皇舆全览图》的完成。此次活动主要由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具体负责完成。在当时实测过的全国 631 处地方的经纬度中，蒙古地方就占据了 93 处。从最近公布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河套图》、《色楞厄河图》来看，此次测量的准确度较高。哈密以西地区因由蒙古准噶尔部统治，西域的实地测量是从准清战争基本平息的乾隆二十年才开始的。后一次的测量工作虽然由何国宗、明安图等人主持进行，但也有傅作霖、高慎思两名传教士参与其中，并制成《西域图志》。这样在康熙图的基础上，加之新测绘的新疆图，使得全国完整的新图——《乾隆内府舆图》（或十三排图）得以诞生。

河南大学赵广军所作的题为《道咸间西北舆地研究中基督教知识的传播》的报告指出，道光、咸丰年间兴起的开眼看世界思潮、西北史地研究思潮，是传统的经世学风在 19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国文化应西方文明自我调整的产物。此时，清廷对基督教教禁的开弛和保教条约的初步形成，使来华西教教士得以在五个开放口岸进行文化活动，其报刊、出版、教育等文化事业逐渐影响了一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引领下，中国知识界兴起了关注世界史地知识和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产生了大量的史地著述。通过对这些著述编写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它们所记载的西教知识在近代中国知识界内传播的特殊途径。

经过 4 天紧张而热烈的讨论，学术活动于 5 月 31 日下午圆满落幕。本次活动是首次在内蒙古地区举行的围绕基督教在塞外传播历史，探讨近代边疆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学术活动，旨在促进学界对边疆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进行多方面、多学科的研究。对此次会议的学术水平和组织工作，与会者予以高度评价。谭永亮博士在会议闭幕式上激动地说道：“这次会议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高潮，使我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力量和兴趣。”卓新平教授认为，内蒙古大学的这次会议促进了相关省区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扩大了其国际及国内学术联络与交流，对其学科建设有着重大意义。狄德满教授则强调，会议组织者将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并且选择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举办有关基督宗教研究的学术会议，这本身具有里程碑意义。吴小新博士也表示，这次在内蒙古大学举行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无论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上还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希望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和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能够继续合作并将中国内地和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学者的声音一同传播到世界各地。

Beyond the Great Wall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in Modern China Hohhot, China, 26-31 May 2009

Sodbili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Abstract: This conference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and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The aim of the conference is to produce worthwhile academic research and to contribute new knowledge to the field of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y beyond the great wall.

Key words: Beyond the Great Wall;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Christianity

收稿日期: 2009-06-24;

作者简介: 苏德毕力格（1962—），男，蒙古族，内蒙古镶黄旗人。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主要从事近现代蒙古史研究。